

观照文明『更生』之路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更生

在关于中国文明的讨论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列文森的“儒教中国”观，还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等，这些观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学者马勇带来了文明通史著作《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该书回溯中国文明从蒙昧到成熟、从分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放的完整脉络，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中国文明的叙事体系，为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未来提供了新思路。



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代

更生密码：“中国化”与“化中国”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的差异必然导致对抗冲突，甚至将中国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潜在对手。马勇以中国文明数千年交融史为依据，明确反驳这一论断：文明或有短暂冲突，但终究走向融合，中国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化”与“化中国”双向互动、迭代更生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从起源阶段便已显现。秦汉之前，各地文明差异巨大，冲突不亚于当今世界各大文明，但经过轴心时代的交流淘洗，逐步淡化差异，凸显共性，形成统一的中国文明概念。两汉之际佛教东来，是异质文明对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儒、道文明与佛教文明历经数百年冲突、磨合，最终实现深度融合。这种双向改造，证明异质文明相遇，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成就，共同提升。

唐宋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唐代广州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宋元海上贸易高度发达，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阿拉伯、波斯、印度等文明源源不断传入中国。明代中晚期，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科学、哲学、艺术典籍，徐光启、李之藻等士人主动学习，中西文明平等交流、互补互鉴。

遗憾的是，清代康熙年间，中西交流因礼仪之争而中断，清廷逐渐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读书人埋头于考据训诂，远离了时代的浪潮，中国也因此错过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历史机遇，陷入了百年的停滞与困顿。但我们始终要明白，文明更生的动力，从来不会因为一时的封闭而彻底消失，它就像深埋地下的火种，只要遇到合适的契机，便会重新燃起熊熊火焰。

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封闭迷梦，中国重新打开国门。知识界不再纠结于“中西之别”的狭隘认知，敞开心胸，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严复、梁启超、梁漱溟等学者，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努力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文明主动融入世界秩序，用实际行动印证了“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的历史规律。

阮炜的《再造文明》曾聚焦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探讨传统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对接难题。《更生》则又为这种对接提供了历史依据：中国制度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僵化的，始终在自我更新中保持活力。近代以来的制度转型，不过是这种更生逻辑的延续，而非彻底断裂。

马勇在书中反复强调，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与包容。封闭排他，必然走向衰落；兼收并蓄，才能实现更生。这一论断，不仅深刻解释了中国文明为何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更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攻自破。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份关于文明更生的思考，不仅是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回望与总结，更为我们应对现实变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镜鉴与启示。

相关阅读：

- 1、冯时：《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阮炜：《天下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再诠释》，贵州人民出版社
- 3、阮炜：《再造文明：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海三联书店

文明起源：从地方到共同体

“四大文明古国”的称谓，总能轻易唤起中国人心底的文化自豪感，却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认知的误区，仿佛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一条没有曲折、没有顿挫的坦途，从远古径直奔赴今日，实则不然。文明的生长从无坦途，中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中，也曾历经冲突的淬炼、融合的阵痛，也曾有过孤立的困顿、式微的迷茫，最终靠着骨子里的开放、吸纳与包容，靠着兼收并蓄的胸襟，在迭代中更生，在延续中成长，才成就了今日的模样。

要读懂这份坚韧与包容，必先回溯文明的源头。冯时的《文明论》，通过天文考古揭示，中华文明以天文为源头，以文德为核心，并非以国家形态单一维度定义文明，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文明标准。

马勇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探索。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常被视作一脉相承的整体，但其起源并非自上而下的预设，而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到共同体的自然演进。由此他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地方，秦汉之前并无统一固化的文明形态，地方主义是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一论断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华夏文明一元起源”的刻板印象。

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都面临着生存与组织的共同命题。早期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弱小无助，唯有抱团形成共同体才能抵御风险，血缘与婚姻成为维系共同体的核心纽带。马勇注意到，夏商周三代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继，而是长期“共时并存”：商汤灭夏前，商已是夏的方国；周朝建立前，周人部族长期依附于殷商；秦人更是在殷商时期便活跃于西北，与周王朝长期共存。这种共时性结构，决定了早期中国不可能形成统一文明，各地依托自然环境与族群传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周朝分封制的推行，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地方属性。周天子将土地与权力分封给宗亲、功臣，各诸侯国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界清晰。随着时间推移，血缘纽带逐渐稀释，诸侯国凭实力发展，形成齐鲁、吴越、楚蜀、秦晋等不同文化圈。齐鲁近邻而文化迥异，吴越相邻而习俗有别，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鲜明差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崛起，正是地方文化自然分化的结果。马勇由此认为，没有天生的中国文明，只有各地文化在交流、碰撞、融合中逐步凝聚共识，才慢慢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中国文明的神奇之处在于，强大的地方力量，并没有导致分裂。马勇的解释是，从分散的部落到小型共同体，再到方国、诸侯国，中国文明的早期演进，始终围绕“共同体构建”与“地方特色发展”两条主线。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夏商周的草创时期，各地文化在保持个性的同时，通过战争、联姻、贸易等方式建立联系，为秦汉大一统文明的形成埋下伏笔。

早期人类为应对生存危机形成共同体意识，血缘、婚姻成为联结纽带，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共同命题，让中国文明从诞生之初就兼具务实性与包容性。这种源于地方、扎根现实的文明底色，既区别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神权文明，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复合内核：“霸王道杂之”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核心特质，是学界争论千年的议题。

秦灭六国，开启中国大一统时代，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成为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基调。传统史学常将中国古代理度简化为周制与秦制的二元对立，也将统治思想等同于“独尊儒术”的单一体系。马勇认为，这种简化是对历史的误读，中国古代制度文明是“霸王道杂之”的复合体，绝非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

周制与秦制，常被视作古代政治的两极。周制以分封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秦制以郡县制、中央集权、严刑峻法为特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的论断，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立认知，但历史真相远比这复杂。

周制本身并非纯粹的单一体系。周朝分封之下，各诸侯国制度选择差异极大：秦国自立国之初便偏向法家集权，齐鲁以儒学为核心，三晋重功利法治，楚越则保留浓郁的本土特色。即便在周王室中心区域，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周边族群的文明基因持续融入，让周制呈现多元特征。

秦制同样不是单一色调。秦汉帝国与匈奴等族群长期交流，匈奴的制度与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中原，后世魏晋南北朝、辽金夏等政权，更是打破周秦二元框架，创造出混合性制度形态。魏晋的封建与郡县混合、南北朝的民族共治、隋唐的州县制度、宋元的多元治理，都证明中国制度文明始终在融合创新，从未局限于周秦二选一的困境。

在思想层面，“儒术独尊”也并不意味着全天下只有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消灭诸子百家，而是以儒学为主体，吸纳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思想精华，重构博大包容的新儒学体系。汉宣帝直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道破中国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儒外法，儒表法里，王道与霸道相辅相成。

后世之儒家，更像是一种“思想综合体”。法家的严刑峻法、中央集权，被吸纳为政治治理的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养生哲学，融入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墨家的兼爱、节用，转化为民间伦理与治国理念；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天命思想结合，成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支撑。

思想的稳定，是立国之本；路径的选择，首要在于务实，历代统治者的选择，从来不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唯治是从”——只要有利于统治的稳固，有利于社会的安宁，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便兼收并蓄，择善而用。这种“霸王道杂之”的复合特质，赋予了中国制度文明强大的调适能力：分裂之时，能坚守共同的文化认同，维系文明的血脉；统一之时，能兼融地方的差异，激发社会的活力；遭遇危机之时，能通过自我调整、自我革新，延续文明的生机。

此前，尤锐的《天下一统》从政治文化角度，论证“大一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基因，而马勇则补充指出，大一统的实现路径，并非单一制度的强制推行，而是多元制度的兼容并蓄。两部著作对读，能更深刻理解中国制度文明的特质：以大一统为目标，以“霸王道杂之”为手段，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活力，道德教化与法治约束，传统承袭与制度创新。

为故宫人刻画时代雕像

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历经南京、上海，最终迁往大西南，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壮阔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

作家、红学研究者刘心武在发布会上分享了阅读感受。他谈到，让自己为之动容的，是第三部对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挖掘。“什么是国宝？文物是国宝，但是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宝。”他提到书中前后留白、格外醒目的“回家”三个字，“我们中国人灵魂深处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要回家，我们讲究大团圆，我们要团聚，我们要分久必合，我们要破镜重圆，我们要碎玉合璧，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包括我个人心底深处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愫，这就是我们的国宝。”

从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到长篇小说《国宝》，祝勇完成的不仅是文体的跨越，更是从“行为史”到“心灵史”的深化。谈及创作的初衷，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属性切入。他指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它们是历朝历代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先辈们为守护这份文明的壮举。书

写文物南迁的故事，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

《国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何而来——不是来自征服，而是来自守护；不是来自占有，而是来自传承。当文物在战火中辗转，当守护者们在绝境中坚守，一种超越个体的文明力量便悄然生长。为此，祝勇将一个个小人物推至前台，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人物小传，让那些湮没在烽烟中的面孔重新浮现。刘心武认为，祝勇写小说是为了探寻“心灵史”：“他想要写这个人的行为，更想写人物的内心，他不仅要写行为史，还要写心灵史。小说是探索人心的利器，这是所有其他文学体裁都难以匹敌的。”

面对浩繁史实，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这个题太大，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借鉴《四世同堂》等经典的经验，通过小人物、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大时代。他回应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时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走的路、花的钱、所有细节都必须是真的。那文松是假的，但他从大方家胡同到故宫上班的路线是真的；沈芷伊是虚构的，但她投江的那条江，是文物南迁真实上岸的地方。”

著名评论家施战军指出，《国宝》的价值在于它充满了“精英式的细节”——一个细节可

以负载前前后后的命运、人物心智、内心图景。“这个信息量是活的信息量，是审美信息量。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联想很多，触动很多，把所有历史最后都搬到自己心里来，看到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图景。”他认为，在AI、虚拟图像不断侵扰认知的今天，《国宝》提供了一种穿透性的、通透的认知方式。“它既是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同时也是兼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

当那文松在垂暮之年踏上归乡的路，当梅遇影在北京的胡同里迎来半个世纪的团圆，当破碎的玉佩终于在阳光下重新合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重逢，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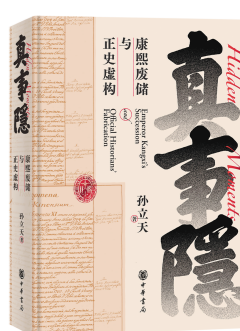
小说第三部结尾是一行字：“人生中他们好像是第一次，可以这样安然地，谋划未来。”这句话道出了整部作品的精神指向：历经离乱之后对团圆的渴望，穿越苦难之后对安然的期盼。“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许就是他们当年所期盼的未来。”

《国宝》三部曲不仅为文物南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立传，更为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守护文化根脉的普通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雕像。在这座雕像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一个文明如何穿越苦难而重生的未来。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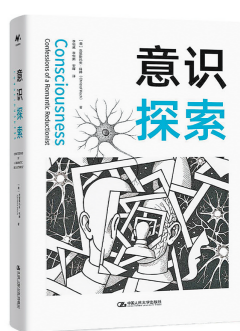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

孙立天 著
中华书局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太子胤礽在随驾巡幸途中被废，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储位之争。雍正登位后，亲自监督编纂康熙朝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及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本书从一套在罗马尘封三百余年、由昔日往来清宫内廷的传教士所作的记录入手，综合运用清宫档案、官修实录、私人笔记等传统文献，钩沉还原被掩盖和篡改的大量历史细节，挖掘出雍正对历史记载进行系统清理的诸多证据，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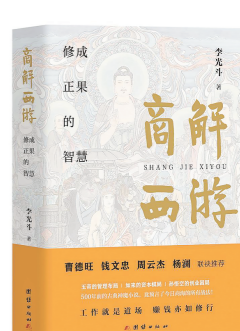
《意识探索》

[美]克里斯托夫·科赫 著
李恒威/李恒熙/安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是什么将痛苦、快乐、颜色和气味等有意识的体验与大脑中的生物电活动联系在一起？有形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非物理的、主观的、有意识的状态？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将其研究生涯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弥合大脑物理事实与现象体验之间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本书即是对此的总结与回顾，其中既有严谨的科学叙述，又有深情的个人回忆，还深刻呈现了作者对意识的经验实证探索过程。



《商解西游》

李光斗 著
团结出版社
本书以《西游记》为蓝本，将西天取经的奇幻旅程，转化为现代职场实战指南，深度剖析其中蕴含的顶级商业哲学、管理智慧和人生真谛，揭示从创业到守业、从团队管理到个人成长的终极奥秘。创业者、管理者，还是渴望突破自我的普通人，或许都能从中获得启发，看懂高层如何做局、做事，清晰个人如何做事、修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真经”。



(□记者 蔡可心 整理)

我与书的故事

父亲买的小人书

□ 杨贵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从小接触到的最早课外读物就是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当时我们也称之为“画本儿”。我的第一本小人书是父亲给我买的。

那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到山下办事回来，买什么好吃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从兜里掏出两本小人书，送给我和哥哥每人一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的小人书，而且是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啊！等我们俩看完自己的那本准备交换着看时，才发现两本书竟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件事母亲给父亲好一顿数落。后来才知道，这两本小人书竟是父亲省下当天的晌午饭钱买的，因为着急赶火车，没来得及看，这才闹出笑话。对于识字并不十分多的父亲来说，那是多么深的舐犊之爱。

从父亲买的第一本小人书开始，童年到少年时代，我陆陆续续看过的小人书不下三四百本。我最喜欢的是打仗和抓特务题材的小人书，像《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奇袭白虎团》等，当然都是借阅读邻居和同学的，从此自己再也没有买过小人书。我记得看过的第一本彩色小人书是《红色娘子军》，当时林场还没放过这部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男主角公洪常背牺牲的情节，至今都难以忘怀。学好人，当英雄，价值观就是从这些小人书中耳濡目染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发展，武侠小说的小人书逐渐成了我的最爱。《七剑下天山》《武当》《螭螂拳》《太极张三丰》等，一看起来就陶醉不已忘记了吃饭；后来电视剧、电影版小人书越来越多。《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射雕英雄传》《少林寺》《武林志》等不知陪伴我度过多少夜晚，四大名著我最早就是通过小人书阅读的。由于这些小人书都是成套出版的，并没有全部看完，当时遗憾、沮丧的心情难以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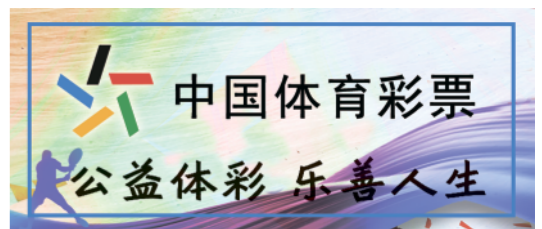
那时我邻居家的一位同学有很多小人书，不下百八十本，他特意做了一个木箱存放这些小人书，甚至给小人书包了书皮，精心呵护到了小气的程度，跟他借阅一下都是很费周折的。幸亏他有时求我给他带功课甚至替他写作业，每次都是用小人书来进行交换，他的那些小人书被我小心翼翼地不知翻看了多少遍。

那个年代，无论小孩还是大人，都喜欢看小人书。市场、商店、车站这些热闹的地方都有摆书摊的，租看一本大约2分—5分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毕业分配到山下小学教书，每到周末上街溜达，还经常到书摊租看几本小人书。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动画片、电视剧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小人书逐渐淡出孩子们的视野。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些天我在旧货摊上看到了几本小人书，不由得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父亲给我买的那本小人书。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了，我十分想念他。

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请用千字左右，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相知、相知的故事。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dazhonggriabawt@163.com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故宫人的时代雕像——《国宝》三部曲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随着第三部《亿兆斯民》正式亮相，这部耗时数载、逾八十万字的著作，以完整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前，《国宝》前两部已荣获数十项行业荣誉。

《国宝》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真实还原